

尼泊尔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宗教动员及其政治影响^{*}

刘 秧^{**}

【内容提要】2008年5月，制宪议会废除了君主制，尼泊尔进入民主共和国时代，结束印度教长达200多年的主导地位。然而，尼泊尔内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甘心丢失印度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信仰、实践和组织机构动员等多种方式希望重建“印度教国家”。在宗教动员的过程中，一方面维护了尼泊尔国家的统一面貌，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加速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助长族群身份政治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传播对基督教等“宗教他者”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各教派之间矛盾。同时，印度教势力加强对尼泊尔的渗透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尼泊尔国内的反印情绪，影响尼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动员；政治影响

【中图分类号】D73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 (2020) 03-0065-08

【DOI】10.13252/j.cnki.sasq.2020.03.09

宗教是政党和政治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也是影响国家间外交关系与国际安全的重要变量。冷战后，宗教复兴浪潮席卷全球，推动宗教进入新的发展活跃期。宗教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宗教化）现象与国际冲突密切相关，宗教成为当代世界冲突和问题探讨中重要的政治意识指导、政治动员的资源、政治分析的根据和框架，并自然成为政治、社会动员的鲜明旗帜。^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恢复印度教统治为宗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扩张，不仅在印度国内煽动教派主义情绪，践行印度教特性政治，影响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而且发起“印度教全球化”运动（Global Hinduism），建构印度教认同，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海外的传播。

2008年尼泊尔废除印度教为国教，从封建君主制国家转型为民主共和国，从世界上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过渡到世俗国家。成为世俗国家以后，尼泊尔不仅受到国内印度教徒的抗议

和抵制，而且被国际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动员，成为传播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国家之一。本文在梳理印度教与尼泊尔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分析尼泊尔受国际和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宗教动员的主要方式，进而探析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宗教力量对尼泊尔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印度教王国”与尼泊尔民族主义的发展

尼泊尔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君主制国家。2006年5月18日，尼泊尔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其为“世俗国家”，废除了印度教的国教地位。尼泊尔从“印度教王国”过渡到世俗社会，自此，1768年入主加德满都河谷、统一尼泊尔的沙阿王朝所确立的印度教国家不复存在。^②

宗教长期以来一直是尼泊尔政治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因素。据尼泊尔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尼泊尔总人口约2649万，其中印度教人口约2155万，占总人口的81.3%，佛教徒占9.0%，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喜马拉雅合作研究”（17ZDA170）、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M623015）、四川大学创新火花项目（2018hhs-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张金平、徐以骅“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宗教动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3期，第68页。

② 马维光“为什么世界惟一的印度教国家不复存在”，《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4期，第28页。

穆斯林占 4.4%，基拉蒂人占 3.0%，基督教占 1.42%。^① 印度教构成了尼泊尔宗教信仰的主体，成为尼泊尔的宗教多数群体。尼泊尔的印度化进程始于 16 世纪甚至更早，在尼泊尔政治统一之后愈加激烈。也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廓尔喀化”（Parbatiyasition）^②，即传播廓尔喀文化，主要包括他们的语言（尼泊尔语）、宗教（印度教）以及种姓制度。在尼泊尔历史上，印度教在统一尼泊尔、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尼泊尔统治者推行印度教主要体现在三个历史时期：沙阿王朝的绝对政权时期（1768—1846）、拉纳寡头政治时期（1846—1951）以及潘查亚特时期（1960—1990）。

（一）阿沙王朝的“asali Hindustan”和“泛廓尔喀”身份的建构

在尼泊尔山地定居的印度雅利安人源于北印度的高种姓移民，他们为了逃离穆斯林对恒河平原的征服，带来了一种被称为“防御性印度教”（defensive Hinduism）的宗教形式，因为他们进入山区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宗教。^③ 随着印度统治者征服越来越多的地区并最终统一所有分散的王国，这种防御性印度教为未来几个世纪尼泊尔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调。到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去世时，廓尔喀王国包含了今天地图上的尼泊尔东部和锡金的部分地区。在 1816 年与英国的廓尔喀战争后，又确定了尼泊尔南部的边界。因此，廓尔喀王的征服不仅是尼泊尔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而且也是讲尼泊尔语的印度教高种姓统治其他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开始。

沙阿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将尼泊尔描述为“asali Hindustan”，意为

“印度教徒的真正土地”，是由“4 个 varnas 和 36 个 jats 组成的花园”。^④ 沙阿国王被视为“印度教的救世主”（savior of Hinduism）。在这个国家中，国王是沙阿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根据印度教传统，国王被视为从神圣中获得权威，这反过来使他成为“主权的统治者、领土的保卫者、道德秩序的守护者、传统的支持者，以及所有精神和世俗权力的源泉”。^⑤ 从这个意义上，除了政治权力授予国王权威之外，他还在社会宗教领域行使仪式权威。因此，信仰印度教的国王对尼泊尔的纯洁和秩序极为重要。

1817 年，第三次英国-马拉塔战争后，马拉塔王国解体并落入英国之手，廓尔喀王国成为印度次大陆唯一和独立的印度教王国。尼泊尔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的概念也由此开始，并且逐渐成为国家自我认同的核心。统治者从印度教中获得合法性，被征服的尼泊尔人民的印度教化也由此开始。在国家统一之后，将印度教传播到王国各个角落的过程愈演愈烈，使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多元文化和宗教进行同质化也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的共识。基于此，他们提出构建一个“泛廓尔喀”（pan-Gorkhali）身份的想法^⑥，即主要由尼泊尔语和印度教构成，用以区别于印度平原上的印度教。泛廓尔喀身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尼泊尔的民族主要包括马嘉族（Magar）、古隆族（Gurung）、塔芒族（Tamang）、塔卡利族（Thakali）、拉伊族（Rai）、林布族（Limbu）、夏尔巴族（Sherpa）、苏努瓦尔（Sunuwar）和菩提亚族（Bhotiyas）；第二，尼泊尔是一个印度教国家，其他宗教如基兰提教（Kirantis）、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可以忽略的少数派。

①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11,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s://cbs.gov.np/wp-content/uploads/2018/12/National-Report.pdf>.

② Pradhan R, Visweswaran K, “Ethnicity, caste and a pluralist society”, in Visweswaran, Kamala, ed., *Perspectives on modern South Asia: A reader in culture,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John Wiley & Sons, 2011, p. 102.

③ Sharma P R: Nation-Building, Multi-Ethnicity and the Hindu State. In: Gellner D, Pfaff-Czarnecka J, Whelpton J: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Nepal*. 2nd Ed.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p. 267.

④ varna 指所有种姓的人, jat 指所有社区, 包括种姓、种族和宗教社区。Varnas 和 Jats 主要指传统的印度教种姓以及它们派生出来的相关职业。

⑤ Sharma P R: Nation-Building, Multi-Ethnicity and the Hindu State. In: Gellner D, Pfaff-Czarnecka J, Whelpton J: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Nepal*. 2nd Ed.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p. 475.

⑥ Aryal D. Discourses of Biratā (Bravery) and Shānti (Peace) in School Level Nepalese textbooks. *Bodhi: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2, No. 1, 2008, pp. 89-116.

（二）拉纳家族与“穆鲁吉艾恩（Muluki Ain）”法典

1846年，忠格·巴哈杜尔·拉纳（Jang Bahadur Rana）软禁沙阿家族成员，任终身首相，开始了持续105年的拉纳家族独裁统治时期。到了19世纪中叶，尼泊尔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更加集中，统治精英不仅获得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对土地的更多控制，而且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中建立了一个更加同质化的印度教文化矩阵。在这100多年中，拉纳家族通过引入一系列基于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法律来推进尼泊尔的印度化进程。

1856年1月12日，颁布了穆鲁吉艾恩（Muluki Ain）民法大典，拉纳家族试图进一步统一和整合尼泊尔不同的族群，以法律的形式淡化多元文化。实际上，这些法律造成尼泊尔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该法典将族群置于印度教的等级种姓制度中，尼泊尔民众被分为三个类别：（a）顶部的婆罗门（Tagadhari，戴“圣线”^①的种姓）；（b）中间的玛特瓦力（matwali，饮酒种姓和族群种姓）；（c1）首陀罗（Sudra，不洁净但可接触种姓）和（c2）阿奇尤特（Achhut，不洁净和不可接触种姓），该种姓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民法大典巩固了尼泊尔的种姓制度，将整个尼泊尔社会置于一个基于正统的印度教观念的单一法律体系之下，以确保统治者对一个静态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即“基于印度教仪式的洁净观念，穆鲁吉艾恩法典规范每个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使得社会或政治流动几乎不可能”。^②由此，拉纳家族在渐进且几乎难以察觉的过程中接受了印度教的传统和高种姓的统治地位。

（三）潘查亚特时代和君主制印度教国家

1950年，特里布文国王宣布拉纳政权结束，实行君主立宪制，尼泊尔进入现代国家。1955年，特里布文的儿子马亨德拉（1920—1972）继位，并于1960年解散当选政府，颁布新宪法，

在尼泊尔实施“潘查亚特”（Panchayat）制度。潘查亚特制度的社会目标是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消除动员大众过程中产生的障碍，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其前提是在维护民族统一的同时，把尼泊尔人民自古以来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等传统价值视为尼泊尔的民族特征。^③在潘查亚特制度中，国王作为制度的创立者和一切权力的源泉高居于金字塔顶端，掌控着国家决策大权。1962年4月的新宪法首次将国家定义为“印度教君主制国家”，印度教的国家地位得以继续强化。为了获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马亨德拉国王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取消所有承认种姓和基于种姓的法律，试图推动一种略有改革的印度教。然而，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他不愿意将这些变化纳入法律，强烈的印度教偏见继续主导主流政治，其中就有诸如“屠宰母牛可判处最高12年的监禁”的条文。^④

潘查亚特政权时期是尼泊尔为了拥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国家而进行大量努力的时期。1951年拉纳家族专制政权的结束并没有使尼泊尔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印度教徒和低种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尼泊尔继续由高种姓统治，拉纳时期的法律也基本得以保留。尼泊尔1951年和1959年临时政府的宪法，仍坚持尼泊尔是一个印度教王国。

（四）君主制的终结与“印度教王国”的衰落

1990年，尼泊尔爆发大规模“人民运动”，比兰德拉国王被迫结束潘查亚特体制，宣布恢复多党民主制度，并颁布尼泊尔历史上第三部《宪法》。《宪法》赋予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并禁止基于宗教、种族（barna）、种姓（jat）或民族（jati）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它还宣布尼泊尔是一个多民族（bahujatiya）和多语种（bhaubhasik）印度教君主制王国。^⑤在

① 圣线（Sacred thread）包括统治精英，主要是上层种姓婆罗门、Thakuri和Chhetri。是指印度教徒前两个等级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在一种仪式上套在身上的一根细绳或线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肋，以区别于其他种姓的人。因为第三等种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按规矩不能佩戴。

② Hoftun M, Raepur W, Whelpton J. *People, politics & ideology: Democr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Mandala Book Point, 1999, p. 3.

③ 王艳芬 “论尼泊尔潘查亚特体制的历史影响”，《史学集刊》，2008年第5期，第91页。

④ Hofer A. *The Caste Hierarchy and the State in Nepal: A Study of the Muluki Ain of 1854*. Lalitpur: Himal Books, 2004, p. 188.

⑤ Mandal M. *Social Inclus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Nepal*. KW Publishers Pvt Ltd, 2013, p. 102.

潘查亚特体制的最后几年,尼泊尔国内种族和宗教意识逐渐增长,对印度教国家的反对也越来越多。在此之后,尼泊尔第一次面临严重质疑印度教国家属性的情况,争取世俗国家的运动愈演愈烈。2006年5月18日,尼泊尔议会决定废除印度教为国教的条款,宣布尼泊尔为世俗国家。此外还宣布诸如减少国王的津贴和特权,取消国家机构的“皇家”头衔、军队受政府控制等一系列内容。这是尼泊尔政治转型的重要节点,尼泊尔经历了从内战到和平,从极权主义到民主政治,从宗教民族主义到世俗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2008年5月,制宪议会废除了君主制,尼泊尔进入民主共和国时代。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尼泊尔的宗教动员

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网络,使世俗权威相对弱化及使暴力合法化等特性。^① 根据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专家肯尼斯·沃尔德(Kenneth D. Wald)宗教介入政治的基本分析模式,信仰性、实践性和组织机构性是宗教参与政治的动力核心。废除印度教为国教以来,支持重返“印度教王国”的右翼势力开始在尼泊尔全国范围内进行有组织的动员,通过开展抗议游行甚至发动暴力活动挑战世俗主义权威。尼泊尔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信仰、实践和组织机构动员不断重申印度教的国家地位、强调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势力作为“宗教他者”的威胁以及组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机构以实现其“重返印度教”,建设“印度教国家”的政治目的。

(一) 重申印度教的国家地位

尼泊尔历史上,很少因宗教问题而引发大规模恐怖暴力事件,印度教王国被认为是尼泊尔宗教和谐的主要原因。1944年,萨瓦卡尔(Savarkar)在对印度大会党的演讲中不断称赞“独立的印

度教王国尼泊尔”,甚至建议尼泊尔国王应该成为整个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的国王。^② 尼泊尔被印度教徒视为印度教统治的最后一个堡垒,是全世界印度教徒的骄傲。在尼泊尔被宣布为世俗国家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现在已经堕落,它的纯洁正在被“敌人、恐怖分子、罪人、世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攻击”所玷污。^③ 尼泊尔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世俗主义是国外的思想,是外国阴谋的产物,旨在尼泊尔多元化宗教团体之间播下分裂的种子。印度民族主义者重新定义“印度教国家”的要求被视为保护尼泊尔文化统一和政治主权的重要手段。

尼泊尔政治问题研究专家苏丁德拉·夏尔玛(Sudhindra Sharma)认为,尼泊尔作为印度教国家的标志主要体现在禁止牛屠宰、宗教转换禁令、梵化政策以及支持印度教节日四个方面。^④ 第一,牛在尼泊尔是印度教最有力的象征。对牛的屠杀一直是非法的,虽然在法律的实践中很少得到严格执行,但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忌讳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经常将禁止牛屠杀作为保护印度教国家的重要体现。在尼泊尔宣布为世俗国家以后,尼泊尔驻新德里大使德普·库马尔·乌帕德希亚(Deep Kumar Upadhyay)曾表示,“牛仍然是尼泊尔的国家保护动物,其屠宰或食用将受到惩罚”。^⑤ 第二,尼泊尔国家支持庆祝众多的印度教节日。在国家法定的19个节日中就有13个是印度教节日,以尼泊尔传统节日宰牲节(Dasain)为例,它被认为是尼泊尔历法中最重要的节日。宰牲节不仅是尼泊尔民族认同的象征,而且还是表现印度教国家身份的一种手段。在潘查亚特制度结束之前,庆祝宰牲节成为尼泊尔国家团结的方式,那些没有参加的人被认为是

① 徐以骅,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12页。

② McKean L. *Divine Enterprise: Gurus and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90.

③ Liuhto M. *Himalayan Hinduwa*. uniwien, 2012, p. 87.

④ Sharma. Sudhindra., “The Hindu state and the state of Nepal”, in Dixit, Kanak, Mani Shastri Ramachandaran, eds., *State of Nepal*, Lalitpur: Himal Books, 2002, pp. 27-30.

⑤ “Cow slaughter still punishable under new Nepal Constitution: Nepalese Ambassador to India”, Oct 8, 2015, <https://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cow-slaughter-still-punishable-under-new-nepal-constitution-nepalese-ambassador-to-india-2132631>. (2019-4-20)

“尼泊尔社会的外来者”。^① 第三，将印度教文化引入尼泊尔教育体系。古代尼泊尔教育系统以印度教和佛教哲学为基础，包括梵文教育体系 (Sanskrit education system) 和佛教寺庙教育体系 (gompas) 两种形式，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尼泊尔现代教育将印度史诗插入教科书中，特别是通过印度教神圣语言梵语进行教学，也成为尼泊尔与印度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象征。因此，对梵语的反也被视为对印度教本身的反对。第四，禁止转变宗教信仰。1990年尼泊尔《宪法》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在适当考虑古代习俗的情况下，自由地信奉和实践自己的宗教，但任何人无权皈依另一种宗教。”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主张皈依的人是印度教的敌人。2018年8月，尼泊尔通过一项法律，将转变信仰定为犯罪。新修订的“民法和刑法”重申了对宗教皈依的限制，规定以任何方式鼓励或参与宗教皈依的人都将定为刑事犯罪，将面临5年监禁和5万尼泊尔卢比 (445美元) 的罚款。任何被认定犯有鼓励或促进宗教皈依的外国人将在一周内被驱逐出境。^②

(二) 强调“宗教他者”的威胁

不断强调“他者” (other) 对“我者” (self) 的威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建构印度教认同的重要手段。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在现实世界中不断确认“我者”和“他者”的关系，进而达到团结“我者”的目的。尼泊尔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和政党将宗教“他者”基督教视为主要威胁，通过话语不断建构、传播以及动员多数人对少数群体的恐惧。宗教间的威胁很容易被构建、膨胀和传播。以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为例，他们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资料来制造或夸大“穆斯林威胁”。在历史的书写中，

穆斯林被视为“印度教仇杀者”而合法化。

与印度国内印度教徒仇视穆斯林不同的是，基督教被尼泊尔的印度教徒视为主要敌人。尼泊尔的印度教徒认为“与基督徒不同，穆斯林总是遵守国家对转变的禁令”。^③ 这也致使尼泊尔的印度教倡导者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督徒身上。印度教意识形态背后的驱动力从一开始就是对改变宗教信仰的恐惧，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的转变。这种信仰转换对印度教徒的威胁也成为尼泊尔印度教徒言论的共鸣。尼泊尔于20世纪50年代末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官方数据称不到30名基督徒，截至2008年，这个数字已接近100万甚至200万。^④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基督徒描述为咄咄逼人的宗教狂热者，向印度教徒灌输对快速增长的基督徒人口的恐惧，声称基督教人口将很快超过印度教人口成为尼泊尔的多数。尼泊尔民族民主党领导人帕舒帕蒂·班达里 (Pashupati Bhandari) 表示“皈依基督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教会，教会由西方国家的新殖民势力和团体资助和控制。如果我们允许转换继续下去，尼泊尔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完全停止转换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尼泊尔成为印度教国家”。^⑤

(三) 组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机构

作为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宗教组织是实现宗教目标、进行宗教实践的载体，是聚合宗教信众的媒介，并且“尤其适合于加速动员”。^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国内以奉行“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的右翼势力迅速崛起，并通过与政治右翼的结合形成了以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为母体，印度人民党 (BJP) 为政治先锋，世界印度教大会 (VHP) 为宗教组织，致力于传播印度民族主义的“团家族” (Sangh Parivar)。^⑦ 他

① Holmberg D H. *Order In Paradox Myth, Ritual And Exchange Among Nepals Tamang*.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6, p. 226.

② “Demand for restoring Nepal's Hindu identity growing stronger”,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hindujagruti.org/news/115951.html>, 2019-3-21.

③ Sharma S. Lived Islam in Nepal. In: Ahmad, Imtiaz, and Helmut Reifeld, eds. *Lived Islam in South Asia: Adaptation, Accommodation and Conflict*.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p. 116.

④ Fricke T. Tamang Conversions: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Christian Conversion Narrative in Nepal. *Contributions to Nepalese Studies*, Vol. 35, No. 1, 2008, p. 35.

⑤ “Demand for restoring Nepal's Hindu identity growing stronger”, February 18, 2019, <https://www.hindujagruti.org/news/115951.html>, 2019-3-20.

⑥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49.

⑦ “团家族” (Sangh Parivar), 又称同盟家族，将“印度教特性”作为其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印度人民党 (BJP)、印度国民志愿团 (RSS)、世界印度教大会 (VHP) 和由这三个组织所建立的工商、学生、青年、妇女等组织。

们大力倡导“印度教特性”(Hindutva),宣扬建立一个国家(印度教国家)、一个民族(印度教民族)和一种文化(印度教文化),主张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实行“印度教化”。^①“团家族”建立的组织机构不仅在国内动员、煽动教派主义情绪,践行印度教特性政治,影响印度国内政治的发展;而且积极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的议程,推动世界各地印度“侨民”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传播。受此影响,尼泊尔也组建了众多与“团家族”有密切联系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机构。

20世纪40年代,马亨德拉国王为了反对世俗力量对王权的威胁,开始寻求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支持。这也成为尼泊尔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机构建立联系的开端。在潘查亚特时期,尼泊尔被广泛宣传为“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国家”。国内民族主义者试图从邻国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特别是印度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那里寻求支持。在此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团家族”被认为是合适的选择,并逐渐与尼泊尔王宫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亨德拉国王任命的第一任总理图尔西·吉里(Tulsi Giri)就曾是印度国民志愿团的志愿者。实际上,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把尼泊尔视为更大或不可分割的“印度文化圈”(akhand bharat)的一部分^②,是他们实现“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的重要目标。

20世纪90年代以前,尽管印度教思想已经进入尼泊尔,但其影响仍然仅限于王宫之内。印度教相关组织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大规模运动来动员尼泊尔公众,因为印度教受到国王的保护。此外,“团家族”及其相关组织在60年代的印度也没有像80年代那样强大。90年代,伴随国内的“人民运动”推翻了潘查亚特政权,尼泊尔的印度教属性突然受到严重质疑,导致印度教民

族主义组织在尼泊尔逐渐增加。1981年,比兰德拉国王在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下成立了世界印度教联盟(Vishwa Hindu Mahasangh, VHM或World Hindu Federation, WHF),该组织隶属于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1988年,世界印度教联盟将比兰德拉国王加冕为“全世界印度教徒的国王”(Vishva Hindu Samrat, “the Emperor of all the Hindus of the world”),试图将他作为印度教象征的合法性扩散到周边国家。

1992年,印度志愿服务团(Hindu Swayamsevak Sangh,简称HSS)作为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尼泊尔的分支机构正式成立。该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该组织已在尼泊尔的35个地区(主要是在特莱地区)开设办事处,并在53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③HSS认可RSS的组织和动员方式,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直接来源于RSS。RSS在尼泊尔拥有出版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分销网络和书店。他们通过在尼泊尔发行小册子、书籍和报纸传播印度教特性思想。其中,HSS在加德满都至少有两家出版公司用于制作尼泊尔语和印地语的小册子。他们还出版《喜马拉雅湿婆》(Himal Dristi)的双周报纸。此外,在与印度接壤的特莱平原也成立了众多活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如尼泊尔湿婆军党(Shiv Sena Nepal)^④、尼泊尔国防军(Nepal Defence Army, NDA)^⑤等。除了印度教民族组织以外,还成立了支持重返印度教王国的政党尼泊尔民族民主党(Rashtriya Prajatantra Party, RPP)。^⑥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

(一) 维护尼泊尔的国家统一面貌,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

沙阿王朝以来,统治者对尼泊尔的统治即建

① 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② Śarmā P.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Nepal: Historical foundation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Himal Books, 2004, p. 295.

③ Amish Raj Mulmi, “Nepali Hindutva”, *Himal Southasian*, July 2011.

④ 尼泊尔湿婆军党,起源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1998年成为一个政党,是激进的右翼印度教特性政党,采取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印度湿婆军党同样的运作方式。

⑤ 尼泊尔国防军,主要由士兵和警察组成,他们声称正在为恢复印度王国而战,主要驻扎在特莱地区,并对许多暴力行为负责,包括谋杀基督教牧师,袭击清真寺等。

⑥ 尼泊尔民族民主党,成立于1990年5月29日,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思想支柱,是尼泊尔的一个右翼、文化保守党派。主要由前潘查亚特时代的政治家组成,旨在支持尼泊尔重返印度教王国,支持君主立宪制。

立在以印度教为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统治者通过至上而下地传播“印度教廓尔喀国王不可置疑的权力和权威；印度教徒在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基于种姓划分的印度教社会制度的社会融合；以及将尼泊尔语作为政府、行政和教育的语言”^①，印度教的思想已经深深嵌入尼泊尔的习俗、仪式、思想以及生活方式之中。尼泊尔各民族依靠印度教和王室的权威维持国家的统一面貌。虽然在《宪法》中尼泊尔不再被赋予“印度教国家”的称号，但在宗教和社会层面上，印度教在尼泊尔社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在尼泊尔“印度教化”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始终与尼泊尔统治者的合法性密切联系。在潘查亚特体制下，君主制和印度教被认为是国家的象征。国王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而且是立法、执法、司法所有权力的来源。1990年尼泊尔《宪法》规定“国王是伟大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国王的子孙，是雅利安文化和印度教的追随者；尼泊尔是印度教君主制王国；国王是尼泊尔民族和尼泊尔人民团结的象征。”^②尼泊尔的君主们也努力阻止印度和尼泊尔世俗力量之间的任何联盟。贾南德拉国王每两年访问印度，参观印度的宗教圣地，被认为是尼泊尔试图维系印度教君主制以及在全世界倡导印度教的表现。“印度教王国”的标签不仅赋予尼泊尔一定的文化“软实力”，而且作为一种象征，在无形中起到维护社会经济制度，支持印度教及其内部高种姓，最重要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的作用。

（二）加速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助推族群身份政治运动的高涨

在廓尔喀王国时期，统治者试图在其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同质化的廓尔喀认同（Gorkhali identity）。这种认同基于统治者和精英的山地高种姓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他们将尼泊尔语作为唯一的国家语言，通过推行印度教和君主制来创造一种同质的民族认

同。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垂直构建的等级制度，基于出生和地理起源的不平等社会。因此，一旦这种结构建立起来，尼泊尔就会促进一个支持印度教高种姓群体的不平等的等级社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③尼泊尔的种姓制度否定了基于多元文化价值的尼泊尔人民的民族认同概念，自然将边缘的文化、宗教和语言排除在国家结构之外。

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和政党则强调印度教作为一种“永恒的宗教”，印度教应该成为尼泊尔和南亚国家的共同遗产。1990年尼泊尔废止无党派的评议会制后，以山地高种姓为尊的秩序很快被族性的多元性所打破，政府长期压制的民族差异迅速转换为政党分化和政治斗争的动力，并演变为以反山地高种姓，以争取本民族利益为目标的民族主义。^④其中，以主张世俗化的非印度教徒发起的尼泊尔本土民族运动（Janajati Movement）进一步助推身份政治运动的高涨。他们要求承认尼泊尔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现状，将非印度教徒与印度教徒同等对待。这种要求的核心是国家的去印度化（诸如，取消国家的印度教符号和仪式），推动尼泊尔的多元文化，以及承认种族群体的独特身份。

（三）传播对“宗教他者”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国内政党和教派矛盾

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少数人的恐惧》（Fear of small numbers）中解释了为何多数会惧怕少数，这是基于对“纯洁性”（purity）和完整性（wholeness）的偏执追求。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掠夺性身份”（predatory identity）概念，意指多数群体意图把少数群体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恐惧动员，为避免自身灭绝而先下手为强。^⑤这些多数人的话语中常常有这样一种观念：除非少数人消失，否则它本身就会变成少数。国外民意调查显示，尼泊尔支持印度教国家的群体主要包括：印度教徒、山地种姓群体、马德西种姓群体、特莱土著群体、尼泊尔国

① Sharma P R. How to Tend this Garden. *Himal*, Vol. 7, Number, 1992, p. 6.

② Hachhethu K. Legitimacy crisis of Nepali monarch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7, pp. 1828-1833.

③ Sen P K. Should Nepal be a Hindu State or a Secular State?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Vol. 35, No. 1, 2015, p. 11.

④ 李静玮 “小国民主中的多元族群：一项以尼泊尔为例的政治人类学解析”，《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第72页。

⑤ Appadurai A. *Fear of small numbers: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1.

会的支持者、右翼政党以及特莱的地区政党。支持世俗主义的群体主要包括：佛教徒、穆斯林、基拉蒂、基督徒、山地土著群体和大多数共产党的支持者。^①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给宗教少数团体如基督教贴上“恐惧”的标签，威胁并警告“宗教他者”：如果尼泊尔不是一个印度教国家，那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泊尔的文化和宗教少数群体越来越自信，低种姓和少数民族之间政治动员加剧，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中，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动员被认为威胁到多数人的主导地位。

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宗教团体相互攻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教派矛盾。尼泊尔拉比提穆斯林协会（Rapti Muslim Society）主席阿姆贾德·阿里（Amjad Ali）称他们在印度教国家下比在世俗宪法下更加“安全”，世俗化是打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长期团结的设计。他还声称班克地区约80%的穆斯林赞成印度教国家的身份。^②尼泊尔民族民主党认为尼泊尔在西方的压力下成为“世俗”国家，世俗主义将稀释尼泊尔的民族主义。在2018年12月举行的尼泊尔国会会议上，1400名与会代表中的700多名表示他们希望恢复印度教国家。他们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将印度教宣布为国教，全面禁止宗教皈依。此外，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中也有人支持恢复尼泊尔为印度教共和国，认为尼泊尔的印度教国王是毗湿奴的化身。^③

（四）加剧尼泊尔反印度情绪，影响尼印双边关系发展

2008年4月，在尼泊尔完全废除君主制之后不久，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尼泊尔“印度教王国”身份的消失表示出极大的恐慌和不满。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聚集了来自39个国家的印度教领

袖，制定了“拯救君主制免于灭绝的运动，恢复邻国印度教特性的自豪感”。^④ RSS书记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表示，对尼泊尔的命运及其象征性身份感到遗憾，鼓励“尼泊尔人民必须保持持久的警惕以保护它的印度教身份”。莫迪政府曾建议尼泊尔政府制定一部宪法，宣布尼泊尔为“印度教国家”。面对印度方面的鼓动，尼泊尔七党联盟（Seven-Party Alliance）领导人莫达那·普拉斯里特（Modanath Prasrit）表示，“没有任何理由让尼泊尔成为印度教国家。尼泊尔更有理由成为佛教国家，因为佛陀在这里出生。”^⑤

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政府进行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工具。印度人民党正是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对身份认同的重塑和强调，使其逐步摆脱了政治边缘化状态。近年来，“团家族”将跨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在世界各地传播印度民族主义议程，试图增强世界各国对印度文化的认同感。2008年以来，印度政府试图利用“团家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提升尼泊尔对印度的感情，然而却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尼泊尔潜在的反印度情绪。2015年印度操纵“马德西牌”、封锁两国边境的行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裂痕。而2019年底，莫迪政府发表新版《印度政区图》，尼泊尔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触发与尼泊尔的卡拉帕尼领土争端白热化，使印尼关系跌至低谷。莫迪非常清楚在尼泊尔实施印度教特性政治的局限性，任何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公开支持都将冒着损害印度与尼泊尔关系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尼泊尔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试图通过宗教动员干预尼泊尔政治发展，但他们的力量十分有限。当然，在未来尼泊尔政治发展中，这股力量却不可忽视，将对尼泊尔政治格局产生持久影响。

① Sen P K. Should Nepal be a Hindu State or a Secular State?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Studies*, Vol. 35, No. 1, 2015, p. 11.

② “Muslims in Nepal demand a Hindu state”, <https://sirfnews.com/nepal-muslims-demand-a-hindu-state/>, 2020-5-29.

③ Jaideep Mazumdar, “Demand For Restoring Nepal’s Hindu Identity Growing Stronger In The Himalayan Country”, <https://swarajyamag.com/politics/demand-for-restoring-nepals-hindu-identity-growing-stronger-in-the-himalayan-country>, 2019-3-20.

④ Anuraag Singh, “How to save Nepal’s King from Maoists?’ Hindu leaders to meet and discuss in UP”, *Express India*, Apr 16, 2008,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how-to-save-nepals-king-from-maoists-hinduleaders-to-meet-and-discuss-in-up/297446/>, 2019-4-15.

⑤ Dahal, Manoj: “The Death of Vishnu.” June 5, 2006, *Outlook India*, <https://www.outlookindia.com/magazine/story/the-death-of-vishnu/231477>, 2019-5-1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tentials of Unimped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Zeng Xing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18, constructs and measures the level of unimped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and applies the expa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unimped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on trade flo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unimped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is generally not high, and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impact of unimpeded trade on trade flows is second only to trade openness and GDP, while finance, e-commerce,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s the core key to promoting unimpeded trade; there is a huge potential for unimped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i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Wang Chunyan

India's wea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imits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etailed data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situation of India i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to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believes that FDI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India's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in high-profit industries lik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icity.

Food Security in Bangladesh: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Li Jianjun & Liu Yuyang

Addressing food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the top priority of Bangladesh'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ecurity in Bangladesh, sums up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acing Bangladesh's food security issues, and focuses on the measures taken by Bangladesh government.

RSS and Modi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an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Movements Perspective

Wang Kai

As a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RSS chose to be partially institutionalized instead of transforming into interest group or political party, which allows it to adopt a dual strategy of contention and engagement, influencing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via institutionalized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s simultaneously. Since Modi came to power, RSS has effectively influenced government's policy-making, achieving its goal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approaches eventually, which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Ram Janmabhoomi movement and GST reform.

The Religious Mobilization of Hindu Nationalism in Nepal 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Liu Yang

After the secularization of Nepal, Hindu nationalists seek chances to rebuild the "Hindu nat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belief, practice, and mobil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ligious

mobi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maintains Nepal's national unity and provides a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the rulers; accelerat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promotes the upsurge of ethnic identity political mov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read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us others"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various sects in the countr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outh Asian Muslim Communities in Germany And its influence on future generations

Lv Sujuan & Zhang Laiyi

South-Asian Muslims take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broad German Muslim communit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outh-Asian Muslim communities were featured as a centralized activity place, diversified membership, form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community life and so on. Meanwhile, they built up the first formal and large mosque in Germany, along with registered Muslim association and community.

Afganistan Peace Talks: India's Perspective

Liu Hongliang

After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fghanistan peace talks in 2015, India used pressure and coordination in bilateral level to express its attitude and interest concerns to Afghan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India's posi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have always been unparallel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rest and relatively limited influence. How to break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India's Afghanistan policy.

The US-Taliban Peace Talks Dur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in Afghanistan

Shen Yuhui

At the end of February 2020, the US and Taliban reached agreement on five aspects: counter-terrorism, withdrawal of troops, exchange of prisoners of war, reduction of violence and domestic dialogue.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agreement, progress has been relatively smooth in counter-terrorism and troop withdrawal, while other fields have faced numerous obstacles. The future domestic dialogue in Afghanistan will be a more challenging political game in th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On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aliban

Zhang Dongshu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various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dopted flexible strategies to pus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aliban to take the lead in signing a peace agree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has not only benefited the United States a lot in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ics and other fields, but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adjustment of its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on China,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as a "strategic competitor,"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